

从女真语到满洲语

金 焘 方

一、引言

正如历史学家不轻易地在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满洲之间划一系列连等式一样,语言学家也同样不轻易地认为以上各民族(或部族)的语言内部具有单向的历史必然连续性。

拿形成民族的不同历史阶段作为语言历史分期的依据,本身就不是十分妥贴的作法;何况语言的发展变化远较民族的演进更为复杂。但是,在我们尚未对满族语言的历史演变规律得出一个科学的结论之前,不妨暂用这种方法作为一个分期的大致依据。我们初步可以把满语的历史划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1. 公元12世纪以前,女真共同体形成之前。
2. 公元12世纪到16世纪,女真语言文字行使阶段。
3. 公元17世纪到19世纪,满族语言文字行使阶段。
4. 公元20世纪,辛亥革命以后。

满语在满洲通古斯语族历史比较研究的领域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满语是满洲通古斯语族中唯一具有文字的语言,满族曾在历史上两度造字,遗留下来如烟海的历史文献;满文是一种比较科学的拼音文字,它能够反映出当时的满语语音的概貌,并且被相邻的亲属语言长期借用;此外,满语的个别方言至今还有保存。因此,无论是进行历时的满洲通古斯原始共同语的古音构拟,还是进行共时的亲属语言的比较研究,都离不开满族语言文字这个重要的基点。

二、16世纪前的满语

满族历史上最早保留下来的文献始于公元12世纪,从那个时候起到现在的满语的历史可以根据文字记载说明;但是,如果要想把视野扩展到遥远的无文字时期,就需要在充分研究与之相关的资料的基础上,运用语言学的方法来探索超出文献直接证明的时距、那更古时候的语言情景。

建立金朝的主体民族女真共同体形成之前,也就是历史上通常认为与女真、满洲具有亲缘关系的肃慎、挹娄、勿吉、靺鞨的时代。

肃慎、挹娄、勿吉虽然在广义上都可称之为满族的族源,但三者在历史上的关系并非一脉相承,而是同时并存(只不过同中原建立联系各有早晚),语言和文化彼此相近

的三个部族。她们其中的大部分是构成金代女真共同体的主要来源，女真文化的形成与这些部族系统的文化具有密切的关系。但是，这些部族语言的面貌究竟是怎样的，各自给予女真语以何种程度的影响，却难以下确切的结论。仅从极为有限的汉文记载中可以得知，“挹娄……言语不与夫余、高句丽同”（《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勿吉……于东夷最强，言语独异”（《北史·勿吉传》）。夫余和高句丽是秽貊系统的民族，其语言大约与古朝鲜语相近。挹娄、勿吉的语言既不同于夫余和高句丽，又在东夷诸语中“独异”，可见是一个自成系统、独立发展的语言。由于没有文字资料，因而无从了解女真以前的祖语的具体特点。只是从《隋书》等以汉字记录靺鞨语音的零星资料看，这时的语言已与后世有文字记载的女真语很为接近了。

至于靺鞨，它本身就是若干部族的统称，与女真有关系的只是其中之一部黑水靺鞨，建立渤海国的粟末靺鞨则是与女真语言、文化悉不相同的秽貊系统的民族。

在这个时期，属于肃慎系统的各个部族尚未进入阶级社会，部族内部的社会组织比较简单，语言也不会太复杂。基本词汇并不丰富，多数是与狩猎经济有关的词汇，语法结构也比较原始。大约从公元9世纪开始，满族的先民就与汉族的先民有了接触。作为交际工具的两种语言，至迟从那时起就开始了通译，从女真语中所反映的汉语借词来看，有些并不是宋朝中叶（金初）以后的音，而是隋唐的音，甚至可能更早。有些本来认为是女真语基本词汇的语词，据考证也源出汉语。因此，满语中的汉语借词的时代很为悠久，根据所借时间的不同当分属若干历史层次。随着汉语语音的不断演变，满语以其本身的构词机能不断地改造着外来语词，因此愈是早期的借词愈是不易分辨清楚。

辽金时期，是女真语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辽代是女真民族形成的初期，辽、北宋把女真人分为生女真、熟女真、东海女真等多部，除系入辽籍的熟女真外，女真其他各部尚未更多地接受契丹和汉的先进文化。进入中原以前的女真人，通契丹语的还为数不多，识契丹字的也仅限于部落酋长阶层的人。金朝的皇室女真完颜部，本是世居黑龙江流域的社会生产力发展较缓慢的生女真之一部。从统一女真各部到灭辽侵宋建国称“金”，女真社会内部经历了急剧的变化。政治上女真人入主中原征服了辽和北宋，文化上所发生的事却正好相反，契丹人和汉人处于征服者的地位，而女真人处于被征服者的地位。随着女真社会的全面汉化，女真语言不可避免地受到汉语的大面积影响。

金代女真语，是以生女真所持方言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民族共同语。从12世纪末到13世纪初，女真人在今天东北、华北和内蒙古的一部分建立了一个割据中国北部的金国，长达120年之久。在这期间，女真民族的共同语从东北推广至淮水以北的广大地区，在其自身受到汉语强烈影响的同时，也使统治区域内的许多汉人学会了女真语。但是这种双语并行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随着全国国势的发展，女真人汉化程度的加深，女真语的应用范围日益狭小，最终只成为政府官方行文和宫廷礼节用语了。这样，华北一带的女真语首先逐渐消失。1234年，金为蒙古所灭，女真语失去了政治上的保障，完全为汉语所取代。金代女真语的资料很少，只能从《金史》、《三朝北盟会编》以及元曲中记载，知道一个轮廓。

元代女真语和明代女真语，始终保持在东北地区。东北的女真人在蒙古族统治下的元朝和汉族统治下的明朝一直沿用本民族语言。元代女真人多充当水军或服务于狗站，明代女真人则统辖于都指挥使司和卫、所。史载当时元代的开元路，水达达等路的女真

人不通汉语，元朝政府也没有强迫这些地方的女真人学习蒙古语，因此东北女真人得以完善地保存了自己的语言。明朝把女真人分为海西女真、建州女真和野人女真三大部，金朝发祥地上京会宁府位于松花江流域，属于海西女真的居住范围。就女真人社会发展状况来说似乎仍是文化较高的地区，和明朝的贡市关系也比较密切。明朝四夷馆所编的《华夷译语》中《女真译语》里的“来文”部分，所录女真首领进贡的表文，绝大多数是海西各部落首领进贡的。由此可见明代女真语是以海西女真所持方言为主的语言。明代初期的女真语，可以从明永乐年间编纂的《华夷译语》中的《女真馆杂字》的注音汉字中知道一个轮廓；明代中期的女真语，可以通过会同馆《女真译语》来了解，前者《女真馆杂字》有女真字，有注音汉字、有汉义；后者则没有女真字，只有注音和汉义。然而同是明代所记录的女真语，永乐《女真译语》与会同馆《女真译语》的汉字，却有相差很大的地方。永乐《女真译语》为明初永乐5年（1407年）成立的四夷馆所辑，这种《译语》中所收的“杂字”当然在这之前，甚至很久以前。会同馆《女真译语》为明末茅瑞徵所辑，底本是会同馆的口译用本，时间约当崇祯年间。其中所录的语音，自然也在崇祯之前。但无论如何二者前后相距总在百年以上，语言是在不断变化的，因而出现了差距。从语言的亲属来看，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的语言同满语支语言的关系近；野人女真的语言同通古斯语支语言的关系近。

女真语与满语在语法结构方面基本一致，其区别主要体现在词汇和语音上。女真语中与满语完全相同的词约占全部词汇量的百分之七十，其余的约占百分之三十。在这百分之三十的词汇中，根据语词的不同情况约可分为三类。

1. **女真语和满语的读音相同、意义不同。**如：ʃuləʃi 女真语是“东”，满语是“往前”；kuʃu 女真语是“皂隶”，满语是“朋友”这类词为数不多，属于词义外延的演变范畴；其本义与转移后产生的意义有一定的关联，大概有方言的因素在内。

2. **女真语和满语的意义相同、读音略异。**如：“厚”女真语是 tiramei，满语是 ʃiramin；“鸭”女真语是 miexə，满语是 niexə。这类词属于历史语音的演变范畴，若干音位在一定的条件下遵循一定的规律变化；还有一部分音变似无规律可循，实则也反映了不同方言的音变，如：“会见”女真语是 ʒaʃʌpie，满语是 aʃʌmpi。

3. **女真语和满语的读音、意义都不相同。**如“南”女真语是 fanti，满语是 ʃulərki；“霜”女真语是 saimaŋki，满语是 kəʃən。这类词所占比例最多。

语音方面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1. 金代和明代女真语的前高元音 i 前面的舌尖中塞音 t、ʈ 在清代满语中发生腭化，变为舌面前塞擦音 ʈʰ、ʈʰʰ。即：ti > ʈʰi、ʈi > ʈʰi。例如：ʈafi [女真语] > ʈʰʰi [满语] “学习”；

mətikə [女真语] > mətʰikə [满语] “信息”。这种音变在满语的亲属语言中还可见到，赫哲语中部分 ti、ʈi 还保持未变。如：

ʈirəkʰn [女真语] —— ʈirəkʰu [赫哲语] “枕头”；

tiramei [女真语] —— tiramu [赫哲语] “厚”。

2. 金、明两代女真语的前高元音前面的双唇鼻音 m，在清代满语中变为舌尖中鼻音 n。即：mi > ni。例如：

miekuru [女真语] > niakʰura [满语] “跪”；

miexə [女真语] > niexə [满语] “鸭子”。

3. 金、明两代女真语的前高元音 i 前面的舌尖中边音 l, 在满语中变为舌尖中鼻音 n, 即 li > ni。例如:

liwaxa [女真语] > nimaxa [满语] “鱼”,

这种音变现象在满语的亲属语言中亦可见到, 锡伯语中个别的 li 音节还没有转变成 ni。如: li [锡伯语] —— nei [满语] “汗”

4. 女真语的前高元音 i 前面的舌面中半辅音 j, 在满语中变为舌中鼻音 n。即: ji > ni。例如:

jiməŋki [女真语] > niməŋki [满语] “油”。

jimara [女真语] > niman [满语] “山羊”

ji 向 ni 的转变, 同样可以在满语的亲属语言中得到印证。如:

jimaka [蒙古语] —— niman [满语] “山羊”。

jiq'an [锡伯语] —— niq'an [满语] “汉人”。

5. 金代女真语的送气双唇清塞音 p', 在明代女真语和清代满语中变为唇齿清擦音 f。即: p' > f。例如:

p'ujanŋun [女真语] > fijaŋku [满语] “老儿子”。

p'oloxo [女真语] > folxo [满语] “槌子”。

在亲属语言中, 例如蒙古语中就有类似的音变现象。共同蒙古语 *p'oq'ar、*φoq'ar > 中古蒙古语 xoq'ar > 现代蒙古书面语 oq'ar。

6. 女真语词首后低元音前面的舌根擦音, 在清代满语中变为零声母 (或者喉塞音)。例如: xaɬapie [女真语] > aɬampi [满语] “会见”

xatu [女真语] > atu [满语] “衣服”

记录清代满语音的满文无法将喉塞音的特点表现出来, 但是从亲属语言的比较中可以拟测清代满语中存在喉塞音。锡伯语词首元音的前面经常出现喉塞音, 如: “野鸡”一词, 锡伯语是 ʔolɣum, 这个词首喉塞音的来源还保存在其他同语族语言里, 鄂温克语便是 xɔkkɔl、鄂伦春语是 k'orkɔl。

三、满语及其方言

清代是满语臻于完善、成熟发展的时期。这时满语已从后金的区域性共同语发展到清代统治者试图将其作为整个中国的全民共同语的阶段, 清代满语的发展遵循了一条与金代女真语极为相似的历程。随着满族入关, 统治疆域的扩展, 满语的使用范围也骤然变大了, 但是在汉语的包围和强烈影响下, 满语不但没有成为名副其实的“国语”, 反而迅速被汉语所同化, 自清中叶就开始走下坡路, 虽历经统治阶级提倡, 终因满语自身的局限性而未能起到名副其实的国语效用。

满族自明末在东北兴起之后, 所建立的国家政权后金, 乃是以建州女真为主体的女真部落联盟。史载以建州为中心的偏东南各部 (苏克苏浒河、浑河、完颜、栋鄂、哲陈及长白山部的讷殷、鸭绿江、珠舍里等) 的方言与扈伦四部 (叶赫、乌拉、辉发、哈达) 的方言不同, 与北方东海三部 (瓦尔喀、虎尔哈、窝集等) 的方言又不一样。但从《清

实录》的记载来看,满语各方言之间的差异并不大,彼此通话没有太大的障碍。清代的满语当是以建州方言为基础方言的民族共同语。辛亥革命以后,满语不但失去了“国语”的地位,就是在民间也濒于消亡。

现代满语包括黑龙江方言、华北——内蒙古方言和锡伯方言。黑龙江方言是指分布在黑龙江省嫩江流域(富裕县、泰来县等地)和黑龙江流域(瑷珲县、孙吴县、逊克县等地)的满族聚居村屯所使用的口语。这一带的满族本是清代驻防的水师,他们祖上来自长白山,即建州女真的故地。由于长期以来地处边远、聚族而居,汉化影响较少,故使得本族语言保存至今。华北——内蒙古方言是指京畿一带及广大蒙古地区残存的满语,如今除少数老年人和专门从事教学与研究的人员通晓以外,已不作为社交工具使用。锡伯方言是指分布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以及巩留、霍城、霍城县等县的锡伯族所使用的口语。锡伯族自十八世纪中叶西迁至伊犁驻防后,一直在本族范围内使用自己的语言。当东北的锡伯族和绝大部分满族随着汉化的加深而丢弃了自己的语言;西北的锡伯族却完整地保存下自己的语言。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将满语的历史发展脉络大致顺理如下:

金代女真语——以黑龙江地区的生女真方言为基础方言;

明代女真语——以吉林地区的海西女真方言为基础方言;

清代满语——以辽宁地区的建州女真方言为基础方言;

现代满语——以黑龙江方言和锡伯方言为代表。

语言发展的特征之一就是各方言之间的不平衡性。通常是使用范围较广、使用频率较高的方言,演变速度大于其他方言。华北——内蒙古方言因较早退出交际舞台,它与满文所反映的语言结构基本相合,没有太大的差异;黑龙江方言和锡伯方言自辛亥革命以后一直在东北和西北局部使用,迄今已近一个世纪,同书面语的距离逐渐拉大。下面就以语音为例,对比分析满语书面语、满语黑龙江方言与锡伯方言的异同。

通常认为,原始满洲通古斯语的基本元音有五个: $a\ \text{ə}\ i\ o\ u$ 。现代满洲通古斯语族的各个亲属语言的单元音数目都多于这五个基本元音。其中大都属于连音变化规律所形成的第二语音层次的前化元音。前化元音的演变公式是:基本元音+前高元音 $i\sim$ 基本元音+辅音+前高元音 $i>$ 前化元音。黑龙江方言有八个单元音: $a\ \text{ə}\ i\ o\ u\ e\ \epsilon\ y$;前化元音有三个: $y\ e\ \epsilon$ 。锡伯方言有十个单元音: $a\ \text{ə}\ i\ o\ u\ y\ e\ \epsilon\ \text{ø}\ g$;前化元音有五个: $y\ e\ \text{ø}\ \epsilon\ g$ 。其中, $y<u+i$ 或 $u+$ 辅音 $+i$; $e<\text{ə}+i$ 或 $\text{ə}+$ 辅音 $+i$; $\text{ø}<o+$ 辅音 $+i$; $\epsilon<a+i$; $g<a+$ 辅音 $+i$ 。方言中的某些借词也被循此规律予以改造,如锡伯方言中的突厥语借词 $pamitor>pgmitor$ 。

锡伯方言位于词首的阳性元音、前化元音及部分中性和阴性元音的前面存在喉塞音,没有喉塞音的元音前面,都存在半辅音,如:发 i 元音时,舌面与硬腭略有摩擦;发 u 元音时,双唇略有摩擦;发 ə 元音时,舌根与软腭略有摩擦。凡辅音开头的词,词首都无喉塞音;由此可知,不带喉塞音的词首元音前必有一个半辅音,这个半辅音是辅音向喉塞音转化的过渡形式。黑龙江方言的大部分词首元音前面也存在喉塞音,什么条件下不存在喉塞音的原因尚待考察。

黑龙江方言与锡伯方言的词重音位置比较灵活,不象书面语那样固定在词干末音节上面。由此引起弱化元音的广泛存在:除单音节词和多音节词的第一音节以外的其他音

节中,处于非重读的元音往往发生弱化,弱化元音的音值受前面的辅音发音部位的制约:在舌尖前辅音的后面音值为 ɿ ;在舌尖后辅音的后面音值是 ɤ ;在其他辅音的后面音值近似 ə (ə 元音弱化后的音值近似 u)。元音弱化后进一步引起脱落,这在锡伯方言中普遍表现出来,在黑龙江方言中不很典型,因此,在音节结构上,黑龙江方言与满洲书面语没有太大的变化;而锡伯方言却因为词末(或词中)元音的大量脱落导致新的音节结构产生。黑龙江方言的音节结构类型共有四种:(1)以元音构成;(2)元音加辅音构成;(3)辅音加元音构成;(4)辅音加元音加辅音构成。锡伯方言的音节结构则除以上四种外,还有元音加复辅音;辅音加元音加复辅音。音节结构的变化又引起了节尾辅音的增加。满语书面语有十个节尾辅音,即: $\text{n m l ŋ r p k s ʃ t}$, 其中 m ʃ l 只能做词中节尾辅音, n ŋ l r p k s 既能做词中节尾辅音也能做词末节尾辅音,最常见的词末节尾辅音是 n 和 ŋ , 可以说是体词的标志;词末节尾辅音 s r p k 只在少数词(摹拟词、副词、形容词及外来语借词)中出现。锡伯方言和黑龙江方言不但具备书面语所有的节尾辅音,还由于元音和音节的脱落以及音变产生了一批书面语所没有的节尾辅音;书面语中只能出现在词中的节尾辅音,在口语方言中也能够出现在词末了。词重音的移位→弱化元音的产生→元音的脱落→音节结构的变更→节尾辅音的增加,这一系列的连锁变化反映了满语方言语音演变的脉络之一斑。

从历史比较的观点考察,原始满洲通古斯语不存在复元音。清代满语书面语中所表示出来的大批复元音,究其根迹,一部分属于外来语借音;一部分属于拼写法的问题。从现代满语方言来看,复元音所占比重极少,有的明显就是外来语借音,如: paupəi (宝贝) xuajavɣi (被划破了);有的是节尾塞音演变的结果,如: $\text{akʰsan} \rightarrow \text{ʔautʰā}$ (雷)、 $\text{akʰtun} \rightarrow \text{ʔautū}$ (结实);有的尚且不能断定是否古代文化借词,但书面语所记录的是复元音在口语中全部单化,如: $\text{qʰauli} \rightarrow \text{qʰoli}$ (规则)、 $\text{xauʂan} \rightarrow \text{xwofĩ}$ (纸),单元音化,应该说是满语固有的语音上的特点,并非语音演变呈现的趋势。

满语方言元音的音变规律主要有:元音的高化、元音的尖化和元音的鼻化。元音的高化表现为书面语的后低元音和尖元音与口语的高元音对应,如: $\text{ʃaran} > \text{ʃira}$ (大汗), $\text{nəwɣin} > \text{niwĩ}$ (平), $\text{fəkʰumpi} > \text{fukum}$ (跳), $\text{ojo} > \text{ʔoji}$ (房顶), $\text{fəwɣilə} > \text{fuwɣil}$ (下)。元音的尖化表现为书面语的低元音和高元音与口语的尖元音对应: $\text{wɣipin} > \text{wɣivĩ}$ (燕子), $\text{amala} > \text{ʔaməl}$ (以后), $\text{faiʃampi} > \text{fəʃəm}$ (排列), $\text{aŋqaqi} > \text{ʔaŋezg}$ (寡妇); $\text{xaxatɣy} > \text{xaxatɣg}$ (儿子)。元音的鼻化表现为书面语以前鼻音,结尾的闭音节词与口语的以鼻化元音结尾的词对应: $\text{sun} \rightarrow \text{sũ}$ (奶子), $\text{ʃirtan} \rightarrow \text{ʃirtā}$ (箭)。

元音和谐现象在满洲通古斯诸语言中表现的程度各有不同。就满语来说,方言的元音和谐比书面语较为简单的规则变得复杂化了,这一方面是由于方言中元音数目的增加;另一方面也与口语音位的不稳定性有关。锡伯方言的元音和谐比黑龙江方言的元音和谐严密,不但具有部位的和谐,还具有唇形的和谐,表现在词法形态上,具有丰富的附加成分变体,大部分词缀都有按词干元音的不同而分别配备的一整套形式。满洲书面语的元音根据传统分类法,可以分为如下三类:

阳性元音: a o ō ; 阴性元音: ə ; 中性元音: i u 。

严格的元音和谐, 应该是阳性元音同阳性元音和谐, 阴性元音同阴性元音和谐, 中性元音既可以和阳性元音、也可以和阴性元音和谐。但书面语中亦存在不符合此规律的现象, 如 *akə* (阿哥)、*okə* (婶母) 等。黑龙江方言的元音亦可分为三类:

阳性元音 *a o ε*; 阴性元音 *ə e*; 中性元音 *i u y*

锡伯方言的元音和谐的划分如下:

阳性元音 *a g ε o ø*; 阴性元音 *ə e*; 中性元音 *i u y*

复元音视其主要元音而定, 在和谐规律方面同于单元音。

满洲书面语与方言口语共有的辅音音位是: *p p' t t' k k' x n m ŋ l s ʃ r f j w ʈ ʂ ʂ'*。满语方言中独有的辅音音位是: *q q' x ɣ ɣ' u l*。书面语中, 小舌音 *q q' x* 与舌根音 *k k' x* 之间存在互补关系, 而在方言中。由于满语第五元音 *u* 和第六元音 *o* 合流, 所以小舌辅音和舌根辅音在同 *u* 元音结合的条件下并不呈互补, 而是具有辨意功能的两组对比性音位。

方言的辅音具有文字所未标记出来的附属性发音特征。书面语只有一套不送气的清擦音; 方言中既有清擦音与部分浊擦音的对立, 清擦音内部又有送气音和不送气音同元音的互补结合而互为变体音存在。即: 送气清擦音与阴性元音、中性元音及前化元音结合; 不送气清擦音与阴性元音结合。较如, 锡伯方言的舌根辅音只能与 *ə u i* 结合, 因此凡是和 *ə u i* 结合的舌根清擦音必然是送气的: *xə x'u x'i*; 小舌辅音只能与 *a o* 结合, 因此凡是和 *a o* 结合的小舌清擦音必然是不送气的: *χa χo*。锡伯方言中的 *u* 元音既能与舌根清擦音结合, 也能与小舌清擦音结合, 因此 *x'u* 音节与 *χu* 音节的区别不光是辅音发音部位的不同, 发音方法还有送气、不送气上的差别。

方言中还有一套腭化辅音和一套唇化辅音, 除节首辅音具有腭化和唇化现象外, 还有部分节尾辅音有此现象。在黑龙江方言中, 含 *ε* 元音的闭音节里, 节尾辅音有腭化现象, 如: *εrjk'e* (酒)、*nerjɣon* (细)、*εmjki* (后)。锡伯方言中含 *g ø y* 等元音的闭音节词里, 节尾辅音也有腭化现象, 如: *jglj* (闪)、*tyrj* (豆子)、*təfj* (狐狸)。关于这类前化元音节尾辅音的腭化, 当属语音史上的一个痕迹。这类节尾辅音后面原本有过 *i* 元音, *i* 把前面音节的元音变成前化元音以后, 有的自己就消失了, 但辅音腭化的痕迹仍然保存着。如果在记音时未把辅音的腭化现象标记出来, 就无法与满洲书面语乃至阿尔泰亲属语言中依然保存 *i* 元音的词对应上。如, 蒙古书面语: *ariki* (酒) *nari:n* (细); 赫哲语: *amitəkə* (后); 满洲书面语: *jali* (肉)、*furi* (豆子)、*topi* (狐狸)。

满语方言辅音的音变规律主要有: 擦音的浊化、流音的清化与儿化、塞音的软化。擦音的浊化表现为口语的浊擦音与书面语同部位的清擦音对应, 如: *ulxuma* > *ʉulxum* (野鸡) *xəfəli* > *kəvəl* (肚子)、*ʃ'ixə* > *ʃ'iɣə* (虱子)。流音的清化和儿化表现为口语的节尾辅音 *r* 发生清化, 节尾辅音 *l* 使前面的元音发生儿化。如: *təviʃ* (夜)、*ʃiŋəʃ* (鼠)、*ʔaməl* (以后)、*q'alfərəm* (滑跌)。塞音的软化表现为口语的擦音或鼻音与书面语相同或相近部位的塞音对应。如: *saŋkjan*——*saŋi* (烟)、*amqampi*——*ʔamyəm* (睡)、*apa*——*ʔavə* (打猎)、*va'kʃan*——*va'xsā* (蛤蟆)。

方言中还存在辅音和谐现象。由于辅音和谐产生的条件限于词缀节首辅音与词干节尾辅音的结合上, 因此, 一般都将此现象处理成“语音的变换”或“语音的同化”。书

(下转36页)

ᠢᠨᠵᠢᠨ ᠵᠠᠭᠤᠨ	越 鸡	ᠵᠢᠨᠵᠢᠨ	京 城
越 鸡		京 城	
ᠬᠠᠨ ᠵᠠᠭᠤᠨ	汉 朝	ᠵᠢᠨᠵᠢᠨ ᠵᠠᠭᠤᠨ	金 莲花
汉 朝		金 莲 花	
ᠵᠠᠭᠤᠨ ᠵᠠᠭᠤᠨ	赋 税	ᠵᠠᠭᠤᠨ ᠵᠠᠭᠤᠨ	灯 草
钱 粮 税		灯 草	

满语借词在构词和形态变化上，具有满语固有词汇同样的语法变化功能。

随着满族入关建立统治，满汉族的交融更为密切广泛。满族在政治上虽然处于统治地位，但在经济、文化以及语言上都受到汉族更为强烈的影响，此乃历史发展必然规律所致。满族统治者为了维护和加强统治，实行文武并治政策。一方面采取严厉的统治措施：强化军政、圈地、八旗驻防垦荒、强迫汉人投充、剃发易服等。一方面吸取、采用汉族的封建思想文化，对汉族地主及其知识分子进行笼络与利用。提倡满族人学习汉语文，汉族人学习满语文，并用汉语文开科取士。这在客观上加强了满汉文化的交流，更促进了满族人对汉族文化的学习与吸收，满语中的汉语借词亦随之而增多。在此情况下，满族统治者为了保持本民族的主要特点，又不得不三令五申地提倡“国语骑射”。为了排斥汉语借词，乾隆朝采取了具体措施：废弃借词、创制新词，改造借词、使之满语化。刊行《御制增订清文鉴》，增加了“新定国语五千余句”。尽管如此，效果甚微。由于人们长期使用借词，而难于接受新词，便出现了新旧词并用的现象，这些词虽音形有别，而意义相同。对此，我们在学习运用中，应注意掌握。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初步了解到满语词汇的主要特点，可见语言词汇的特点是与社会发展状况、民族特点密切相关的。通过了解、掌握满语词汇特点，不仅有助于我们学习、运用满语，而且有助于我们对满族发展史、满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史等进行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上接52页）

面语中没有这种辅音和谐现象。根据和谐的分化，可将辅音归为两类：

第一类：送气清辅音（除 χ 以外的清擦音都送气）。

第二类：不送气清辅音、浊辅音。

两类辅音各自按类和谐，并不相混。比元音的和谐还要严整。例如：

$k'u\varsigma - k'g$ （请剃头） ς 与 k' 和谐；

$k'u\zeta - me$ （剃头） ζ 与 m 和谐；

$fi\eta' - xi$ （出来了） η' 与 x 和谐；

$jav - \chi$ （走了） v 与 χ 和谐；

$sav - \gamma i$ （看见了） v 与 γ 和谐。

在满语及其方言中， r 、 η 不出现在词首； p' 大部分出现在外来语借词或摹拟词中。